

从《才略》篇看刘勰的作家批评论

胡艳琳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每一篇都自成一格,文章取其《才略》篇,从中探讨刘勰的作家批评论。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作家的“才”“气”“性”三方面探讨主观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及因之确立的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标准与原则,张扬文学的主体性、多样性和独创性。第二部分对《才略》所涉及的影响创作的客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使“才略”的视阈得以拓展;第三部分分析刘勰所持的批评作风和批评态度。

[关键词] 文心雕龙;才略;作家论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0)04-0006-03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五六世纪之交,有着完整科学体系和严密结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一部极为重要、无法绕过的巨著。三万七千多字的《文心雕龙》,基本上概括了从先秦到晋宋千余年间的文学面貌,评论了两百多个作家,总结了近百种文体,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1]。《才略》(第四十七)于刘勰文艺理论思路中的定位在《序志》(第五十)论全书的理论框架和系统结构时已有明确展示,它是《文心雕龙》作家批评最集中的篇章。作家批评虽也散见于《文心雕龙》别的篇章中,如《辨骚》(第五)是针对屈原及其《离骚》的批评专论,《体性》(第二十七)对十二位作家作了简要评论,但只有《才略》才是刘勰的作家批评通论。

清人纪昀曰“《时序》篇总论其世,《才略》篇各论其人”^[2],指出《才略》篇是专门批评论述作家的。黄叔琳认为《才略》篇“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真文囿之巨观”^[3]。詹鍈指出“《才略》篇是专门评论作家的才思的。‘才略’就是才思和识略。”^[4]刘永济解释“才略”二字说:“才略者,才能识略之谓也,属之人。”^[5]沈谦在《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说:“彦和论虞夏有皋陶、夔、益、五子四家,商周有仲虺、伊尹、吉甫家,春秋有……六家,战国……七家,两汉有陆贾等三十三家,魏晋则有曹丕等四十四家,总共有九十八家。”^[6]《才略》是对先秦至魏晋历代作家的总评,共论述了98位作家。“褒贬于《才略》”,刘勰是想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对历代作家进行褒贬评价和价值判断,从而确立其在文学史的地位和作用。《才略》正是刘勰的文学观,尤其是作家批评论的集中体现。

《序志》篇具有文学史论的性质,将全书分为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七部分,而《才略》则是与文学史论相配合的作家论。从《辨骚》到《体性》,再到《才略》,可以视为个别与总体、宏观与微观、个案典型与一般研究相结合;又可以视为由个别、个案研究向普遍、整体、综合研究发展,由个体作家研究向文学史研究发展,刘勰自己对这种文学史方法的作家研究的难度和意义是有着自觉的认识

的,他在《序志》中指出: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为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要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攀肌分理,惟务折衷。按譬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心,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7]

这既是对《文心雕龙》全书所做的一个注释,又是对《才略》所作的一个注解。总论不同于专论之处不仅在于要更广的知识面,即他在《知音》(第四十八)中所言的“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8],而且在于它必须在文学史上下前后左右比较中明确定位,更在于批评者必须有驾驭全局、统观整体的更宽阔的视野和更精到的视点及其更强的能力,从而使泛论、通论所涉及的各个作家都有准确、公正的定位,也使他们构成文学史的脉络和整体。因此,《才略》充分体现出刘勰的创作思想和构思思路,也充分体现了刘勰的作家批评和文学批评观。

《才略》全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评先秦作家,第二部分评两汉作家,第三部分评魏代作家,第四部分评两晋作家,第五部分是根据以上评述所作的小结。刘勰以历时性角度和文学史发展的角度,采用略远详近的方式通论作家的创作成就以褒贬评价作家,从而揭示作家的才识、个性、思想、性情、气质、品性等主观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充分体现出“文如其人”的作家批评观和文学评论思路。《才略》篇分别论述和评价历代作家,或褒或贬、或褒贬掺杂,或亦褒亦贬,一分为二地辩证评价作家,其依据的标准和以此要求创作主体所应具备的主观构成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气”,作家文气批评。“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先秦儒道以及诸子各家都曾论述“气”,充分重视“气”的作用,并由天地自然之气引申到人之气,又由人的自然生命之气引申到精神生命之气,从而形成“心斋”、“坐忘”、“养气”等理论。“气”论发展到曹丕的《典论·论文》才将“气”与“文”结合起来,将“气”论引入文学理论,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此后,“气”成为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以“气”论文、以“气”品评作家作品、以“气”论

风格就成为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之一。然而曹丕“文气”说,主要是从文学风格角度来论述“文气”的,刘勰在《才略》中论述“气”,则从文学风格扩大到作家的性格、气质,而且注意到作家的情理和精神个性内涵。诚如周振甫先生指出的:尚气对后来文学评论很有影响,古文家就是讲文气的^[9]。这个“气形于言”的气势,同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指风格的“气”是不同的。所以他说“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孔融气盛于为笔,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阮籍使气以命诗”,“刘琨雅壮而多风”(这个“多风”也是指气盛)。在齐梁时代崇尚声律,讲声律时注意“气有飞沉”的调节,即调节平仄,往往淡化和削弱了文气,会以形式压倒内容,从而出现华丽萎靡的文风倾向。而讲文章的气势,则同情绪有关,情绪激昂则文气昂扬,有气势。这种激昂的情绪多与思想有关,这就接触到情理。刘勰评论作家讲“气”,正是看到了创作主体的情意情理。从“气”的角度来谈作家,具有相当的新意。

当然,刘勰也并不排斥曹丕的“文气”说,他继承和发展了曹丕的“文气”说,扩大了“文气”所包容的内容和范围,他指出曹丕“重气”,也说明自己亦“重气”,从“文气”追寻到作家之“气”,并使之成为创作主体心智情理结构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气”已成为囊括作家性格、个性、气质、风格、思想、情感,乃至个体生命(包括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以及社会时代、民族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从而形成“以气论文”的作家文气批评传统。

其次,“才”,作家才性批评。《才略》篇实质就是作家的才略专论,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对作家创作才华提出的要求,从这一角度而言,作家也可称为“人才”。有无才性、才气、才华、才能、才干、才略,是衡量和评价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刘勰论作家之“才”,首先是着眼文章辞采上的形式美,他在《才略》篇中开宗明义: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径,文亦足师矣。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之圃,耀似缙锦之肆。放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谏,国侨以修辞干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10]

刘勰从上古先秦的文章中首先看到了它的“辞令华采”,也就是看到了文章、文学的修辞效果以及因修辞而带来的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从而从语言修辞的角度来界定和确立文学及其文学的功能、价值和作用。继而,刘勰将文章的辞令华采与作家的才华、才气联系起来,指出作家创作主体构成因素中“才”的重要性,他指出:“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愆而赋清,岂虚至哉”;“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幽远,搜选瑰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谕,不及丽文也”;“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沉月追,垂翼不飞”;“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故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绮”;“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陆机才欲窥深,辞令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对作家创作之“才”给予高度评价,并直接用它来界定作家作品的优劣。

在其他的篇章中,刘勰也注意到了“才”。《体性》中就已注意到风格之“体”与“性”的关系,作为作家创作主体之“性”的构成有四要素(“才、气、学、习”)之一。在《程器》中专门讨论作家的“才”与“德”的关系,主张德才兼备。感慨作家的“才有庸俊”之别是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强调“才”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作为作家主体构成的重要作用。故而刘勰在《才略》篇总结中指出:“赞曰:才难然乎?”他感慨人才难得,也就是感慨人才与文才的关系。

其三,“性”,作家个性批评。刘勰的作家批评论以个性作为依据和标准,强调作家个性的表现,突出个性的文学创作和作品审美效果中的作用。他在《体性》中指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强调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主要源自作家创作个性的多样化,只有“才性异区”的多样化才有可能形成“文体繁诡”的文学多样化。因此,就刘勰所强调的作家之“才”来看,也会因人而异、因才而异而显现出各具个性和特色的“才”。故而刘勰在《才略》中推崇和赞誉的作家之“才”是各有千秋的,如“张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称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恒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憎焉”;“琳瑯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楨情高以会采,应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指出作家因才华、性格、学识各异而形成不同的创作个性,使文学表现出不同的优势和特色,亦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审美旨趣。因此,刘勰以个性评论文章,以个性评论作家,其目的就是张扬文学的主体性、多样性和独创性。

二

虽然刘勰的作家批评以文气、才华和个性来确定其批评标准与原则,从而确定了以“气”论文、以“才”论文,以“个性”论文的批评传统。但他也深知影响文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作家的才气性是影响文学的重要的内在的主观因素,而作家之外的社会、历史、时代环境等客观因素也会对作家作品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既会有正面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消极的影响,对此,批评家必须善于辨别。刘勰继承了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观,将作家放在社会、历史、时代环境中进行辨析,从而使“才略”的视阈得以拓展。

第一,社会动荡变迁的过渡时期对文学的重大影响。刘勰在对历代作家的批评是按社会时代发展的历时性线索来排列的,他除了指出文学随社会时代发展而发展,每一社会时代有每一社会时代的文学及其特征外,还指出社会时代的转换期文学的突出发展现象,如战国时期,正是诸侯纷争、武力割据的社会转型期,但文学则有突出成就: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而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11]

第二,政治地位、权力权势对作家作品的影响。刘勰针对当时文坛对曹丕、曹植两兄弟评论中的扬植抑丕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恒虑详而力缓,故不

竟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惜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12]

刘勰针对旧说以及当时文坛上贬抑曹丕的偏向提出批评,对于纠正文坛偏颇和世人俗见有重要意义,更对评论的标准、原则、方法、角度之确立有重要意义。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曹植在才性上各有所长,曹丕思虑周详故而显得不够敏捷,但他长于精密的辩论文,曹植文思敏捷,才华卓越,辞采华丽,长于诗歌,二者在文学史上都有很高地位。不应该因曹丕政治地位显赫,就断定他是依权仗势作文而无视其兼有的文学才能,也不应因曹植遭受曹丕的排挤,政治地位窘迫而获致历代郁郁不得志之文人士子的同情而增加对其文章的推崇。刘勰秉持一种较为客观公正的文学观,指出世人多因自身情势而形成的同情弱者憎恶豪强的天然政治价值取向在无形中造成抑丕扬植的文学价值判断——“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刘勰认为文学批评应实事求是,公正合理,既不能因作家的政治身份、权势地位而断定作品的优劣,也不能因对作家的情感偏向而评价作品的得失。换句话说就是排除一切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才能获得较为公正的结论。

从某种程度上,刘勰的这一观点带有为文学批评正名的意义,他不希望文学批评掺杂过多的政治因素,不希望文学批评被过多的个人情感偏向所干扰,而希望文学批评真正成为文学的批评,这与魏晋以来“文学的自觉”时代潮流不无关系。即使放在一千五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他的这一论断不失其警示意义。

第三,“贵乎时”,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的兴盛不仅取决于作家的创作业绩,而且取决于文学所处的时代氛围,取决于时代对文学的崇尚、对作家及人才的重视。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侔鄴都。然而魏时语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13]

刘勰指出“贵乎时”是由“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的造成的。

“崇文之盛世”,一方面,统治阶级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尊崇文学与作家,从而为文学的繁荣提供有利条件和自由发展空间,加之盛世之下,经济繁荣、政治昌明、社会安定、制度稳定,也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时机。另一方面,对文学的需求和尊重,在百姓中形成了社会风尚,进而构成有利于文学创作和接受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东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氏父子既是实际执政者,同时又都是诗文爱好者,自身有颇高的文学造诣,今流传下来曹丕的《典论·论文》对文学作了极高的评价,将之视为“经国之大典,不朽之盛事”,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建安邺下文人集团,在邺下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大量地赋诗作文,统治阶级的爱好往往代表了世人的爱好,建安文学能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后世文学仰望的一个高峰,曹氏父子功不可没。

“招才之嘉会”则指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和尊敬。这里的“才”,即指作家的文学创作才能。一方面,作家文才发挥不仅取决于作家个体,而且有赖于社会时代所提供作家群体力量和文学整体效果,一如当年的“兰亭嘉会”、邺下文人集团、竹林七贤等文学性团体。

“贵乎时”还在于文学具有传承性,文学发展逐步构成文学史,并积淀为文学传统,而文学传统作为历史积淀会表征在时代特征上,反过来又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影响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刘勰所说的“一朝综文,千

年凝绵,徐采徘徊,遗风籍甚。”^[14]不仅指出了文学的继承性和文学的自身传统形成了文学发展的条件之一,而且指出了文学在文学传统积淀的新时代中发展的必然。《才略》篇中指出了不少作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如“相如好书,师范屈宋”,“二班两刘,奕叶继采”,“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只有“贵乎时”,处理好个体与传统的关系,作家才能在继承中发展,于传承中创新,文学的发展和创作也因传承而有脉可循,文学才能底气十足地向前迈进。

三

刘勰在《才略》篇中对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的作家进行了历时式、全景式的鸟瞰。从刘勰对近百名作家作品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态度和方法,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是其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各个作家成就和不足的批评态度。比如对司马相如,刘勰指出他“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15]他认为司马相如创作上学习屈原、宋玉,以大量夸张、艳丽的描写,成为一代辞宗。但仔细观察其辞赋的思想含义,就显得思想浅薄而辞藻华丽、内容和形式很不相称了。

其次是“各其善”,据作家不同的才性特长来评述其应有的价值的公正态度。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不以己之长量人之短长,作家各有其擅长的文体,于是《才略》论作家而涉到“各其善也”:

“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曹掾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16]

根据实际创作情况,对已有名望的作家不一味说好,如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对名气不大的作家也能见出他们的长处。如“杜笃、贾逵,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崔、傅之末流也”^[17]。而对另一类在文坛上地位并不显赫的人,也能看到他们的独到之处。如“路粹、杨修,颇忆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18],也就是说路粹、杨修、丁仪、邯郸这些人,虽非名流,但他们或善于章奏,或善于论述,都各有所长。在其他篇章里也指出,“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程器》),只要批评者能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就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知音》),这种认识和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更为可贵的是刘勰批评作家作品,不随人俯仰,人云亦云,而是结合具体作家作品,经认真思考后才下结论,因而他特别反对那种随“俗情抑扬,雷同一响”的批评作风和批评态度。如关于曹氏兄弟的文学成就,多是抑丕扬植。钟嵘在《诗品》中,就列曹植于上品,列曹丕于中品。但刘勰认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未为笃论也”。刘勰对曹氏兄弟的品评没有因袭前人,这并非他有意危言耸听,标新立异以求出位。在《程器》篇里,刘勰指出“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谗”,这与上面所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但应该看到的是,《程器》篇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而具体到曹丕、曹植这一个案来说,因二人同为贵胄而地位悬殊,曹植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并且已经成为历代遭贬抑命运坎坷之文人的精神化身,所以反而会出现“势窘益价”的情况。正如他在《序志》篇里所说的:“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威信,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9],这种不论

同异,但求合理的“唯务折衷”的态度是很可取的。

当然,刘勰的观点、理论亦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周振甫、陆侃如、牟世金、詹鍈等研究者都曾提及。《才略》对历代作家的评价有些地方还有待商榷。如讲到战国时代时,推重诸子散文,历举游说之士范雎、苏秦,对《左传》、《庄子》、《孟子》却只字不提。对司马迁只提到他的《士不遇赋》,没有提及《史记》。论建安文学时不提曹操,反而对不足称道的路粹大加称道。谈到晋代文学时,陶渊明这样的大家却被忽略了。在褒贬作家的得失时,看到了作家的成就与不足,但并没有将作家作品放到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评价其在开创新文体方面的特殊贡献,也及时描述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如左氏的历史散文、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汉末的抒情小赋。在文体论中,刘勰主张“原始以表末”,但在《才略》中却未能贯彻自己的观点。在评价先秦作家时,将一些不可靠的传说,甚至谈不上是文学作品的“皋陶六德、夔序八音”也列入其中;对尹吉甫、马融等人的作品及系后人伪作的《五子之歌》作出极高的评价,奉为“万代之仪表”,而对蔡琰、左芬等女作家则概不提及。

诚然,《才略》有其历史局限性,有不少问题是刘勰所处时代的认识水平不可能作出正确解释的,特别是他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使他对某些作家的评价受到巨大影响。但瑕不掩瑜,总的看来,《才略》篇及整部《文心雕龙》的成就是最主要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文学理论的某些方面或个别论点上,高于刘勰的自有人在,但却没有人在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上超过《文心雕龙》。清人章学诚早已指出《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20];鲁迅则将《文心雕龙》与《诗学》作为东西方文艺和美学各自最有影响的、可相提并论的代表作^[21],游国恩、萧涤非等学者认为“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22]更有人认为“《文心雕龙》可以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黯然失色”^[23],这个评价并不为过。《文心雕龙》研究不仅被称为“龙学”,而且事实上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其文艺思想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有效性,在一千五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不可

低估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游国恩,萧涤非.中国文学(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14.
- [2] 转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5.
- [3] 转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5.
- [4] 詹鍈.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64.
- [5]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183.
- [6] 转引自:詹鍈.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64.
- [7]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中华书局,2005.457.
- [8] 同上,438.
- [9] 同上,420.
- [10] 同上,421-422.
- [11] 同上,423.
- [12] 同上,428.
- [13] 同上,432.
- [14] 同上,433.
- [15] 同上,424.
- [16] 同上,429.
- [17] 同上,425.
- [18] 同上,428.
- [19] 同上,457.
- [20]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M].文史通义校注(上册)[M].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559.
- [21]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记一篇》称:“篇章既富,评鹭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见《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2.
- [22] 游国恩,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14.
- [23] 李庆甲,汪涌豪.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综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

【责任编辑:王云江】

Analyze Liu Xie's author criticism according to Cai lue

HU Yan - 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en Xin Diao Long is a great theoretical monograph which comprehensively studi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artistic approaches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criticism, and each chapter is sui gener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Liu Xie's author criticism according to the chapter Cai Lu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how writer's "talent", "Qi" and "nature", the three subjective factors affect their creation and the consequent influence on the standards and principles of value orientation. Liu Xie claims literature's subjectivity, diversity and originality. The second part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objective factors which influent writer's creation, which expands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the chapter Cai Lue.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Liu Xie's critical style and attitude.

Key words: Wen Xin Diao Long; review of talent; author criticism